

女性主義全球在地化的 理論指向和方法論意義*

暢引婷

[提 要] 與全球化的時代大潮相適應,在地化和本土化作為國與國之間相互交往的一個歷史發展過程,不論是文化上的交流與碰撞,還是政治上的恃強凌弱或以弱抗強,都是世界歷史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在地化、本土化、全球化、全球在地化究竟是指什麼,與此相關的普適性/普遍性、差異性/特殊性等到底該怎樣認識或理解,都需要進一步討論和釐清。通過對相關概念的比較分析可知,宜用全球在地化代替本土化概念。將“全球”與“在地”或“本土”相聯繫,一方面要打通內外,將具有普遍性的性別理論在地化;另一方面須融貫古今,將在地化了的本土經驗理論化;此外還應立足現實,將理論化了的性別知識行動化。進而通過對西方中心和本土父權制結構的雙重挑戰,開拓知識生產的新領域,擴展社會變革的新途徑。

[關鍵詞] 在地化 本土化 全球化 女性主義 普遍性 差異性

[中圖分類號] I0-05; C0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1824 (2020) 04 - 0134 - 13

在近年來的學術研究中,在地化的問題一再被提起。綜覽相關文獻,議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在經濟領域,主要探討資本和商品的輸出,在當地可能或已經帶來的社會經濟效益以及本土對外來資本自覺不自覺的接納或抵制;二是在思想文化領域,一方面探討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包括“新儒學”)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區,是怎樣與當地的歷史文化傳統相互交流並彼此融合的,另一方面討論在相互借鑒與融合中所出現的各種問題以及應對的策略、方法和途徑;三是在文學藝術領域,以文學作品和藝術作品為載體,探討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文化因子是怎樣在當地的歷史環境中產生,又是如何在不同的地域相互影響並歷史地傳承的;四是從傳播學的角度,討論學術文化的跨地域流動在世界歷史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已經或可能遇到的諸多障礙;五是將在地化作為一種社會治理方式進行討論,說明自上而下的國家政策、法律、規章、制度等,應怎樣與在地的實際聯繫在一起。儘管在婦女與性別研究領域有關“在地化”的研究還相對較少,通過關鍵詞和標題搜索僅有兩篇文章,且都是關於女性文學/文化方面的書評,^①但“在地的”、“當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當代中國婦女理論的本土建構研究”(項目號:16BKS131)的階段性成果。

地的”、“本地的”、“本土的”、“在時在地”等詞彙已頻繁出現在其他一些有關婦女與性別的文本敘述中。那麼,何為在地化?為什麼要在地化?怎樣在地化?誰來在地化?在地化與本土化有什麼聯繫和區別?本土化概念近年來為什麼會在中國學界引發爭論?許多研究都語焉不詳。本文從在地化和本土化概念的基本內涵入手,試圖探討女性主義全球在地化對知識生產和人類歷史再建構所具有的方法論意義。

一、在地化、本土化與全球化的內在張力

從近年來中國大陸有關在地化的研究成果看,更多是探討中國的歷史文化是怎樣在其他國家或地區在地化的,^②這可能與中國綜合國力的全面提升以及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增大有關,而探討西方學術文化在中國的在地化,又常常與本土化糾纏在一起,許多研究者將在地化和本土化完全作為同一個概念來使用,甚至不加分區。事實上,不論在地化還是本土化,都與全球化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也就是說,沒有全球化,在地化或本土化將失去存在的價值或基礎;而沒有在地化或本土化,全球化將無以依託或不復存在。

(一)在地化與本土化的聯繫與區別

其實,在地化和本土化兩個概念既有聯繫也有區別,各自所具有的不同內涵,反映了人們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的不同角度,也說明人們運用一定的概念對事物進行判斷時所表現出來的主體自覺意識。從學術文化交流和知識生產的意義上來講,在地化和本土化有著許多相似之處。其一,在歷史根源上,不論在地化還是本土化,雖然強調的都是地方文化的獨特性或差異性,但就其實質而言,則是對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普遍性問題的一種關注,在強調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交流與合作的同時,隱含著對西方文化霸權和經濟殖民的高度警惕。其二,在思維方式上,都是將一定的思想文化從一個地方傳播到另一個地方,大到一個國家或地區,小到一個社區或村莊,都要求與當地的實際情況緊密聯繫,強調的是知識的情境化和特殊性,以及歷史發展的過程性,而不是把經濟發展的結果作為唯一的目標或指標。其三,在社會實踐上,不論“在地”還是“本土”,“化”的實質內涵就是把產生於某一地區,且具有一定普適意義的思想、文化、觀念在另外一些地方落地生根,並能產生一定的社會變革效應。不僅具有“使××變成××”的發展變化的意思,而且還有一種大面積推廣或普遍覆蓋的含義。需要說明的是,在主體身份不明的情況下,在地化和本土化的意義可以說是完全一致的。

就在地化與本土化的區別而言,首先是方向路線不同。在地化是由內而外,指外來者客觀地融入所居地,即從“我國”到“他國”,或從“我們”到“你們”,強調的是由自我出發去推及他者;本土化則是由外而內,指本地者主觀地歸返鄉土,即從“他國”到“我國”,或從“他們”到“我們”,強調的是借鑒他者的經驗來發展自我。其次是行為/行動主體不同。在地化是試圖將“我的”變成“你的”,既有相互之間交流碰撞的文化融合價值,也隱含著“我比你先進”或“我比你好”、並試圖同化對方的政治傾向;本土化是意欲將“你的”變成“我的”,既有吸收借鑒、取長補短的意思,也潛藏著以我為中心的盲目排外傾向——認為“你的”是不適用於我的;同時針對文化交流中的“異化”(主要指“西化”)傾向,強調對民族立場的堅守。再次是理論指向和價值取向不同。在地化關注的是特殊的普遍性,常常與“全球”和“全人類”的發展以及國際主義相聯繫;本土化關注的是普遍的特殊性,常常與本土的發展以及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相聯繫。

由此可以看出,在地化和本土化兩個概念既不能完全對等,也不能截然分離,要根據具體的語

境做出具體判斷。問題的關鍵在於，不論是把“我的”變成“你的”的在地化，還是把“你的”變成“我的”的本土化，最終都要落實到怎樣變、變成什麼樣、變了以後會怎樣等一系列具體問題上。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在地化和本土化作為一個歷史發展過程，與全球化始終伴隨在一起，不論結果或效果如何（對不同的國家而言，將會有不同的結果或效果），都是世界歷史不可分割的重要一部分。如果把在地化和本土化作為一種分析框架，則蘊含著學術和政治的雙重含義：一方面對全球化過程中已經或可能出現的各種平等的或不平等的權力關係進行揭示和解釋，以便使更多的人能看到隱藏在事實背後的諸多“真相”；另一方面通過在地化或本土化的具體行動，對全球化過程中因“趨同化”趨勢而造成的特殊性或個性化的消解進行牽制，並自覺抵制西方中心的價值取向。就在地化和本土化這兩個概念在中國學界出現的先後順序來看，本土化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時代步伐相一致，而在地化則是近年來才出現的一個新詞，且有代替本土化一詞的趨勢。這種狀況也許與“音調難定的本土化”^③不無關係。本文主要以女性主義在全球的傳播為例，對在地化、本土化以及全球在地化等問題做一簡要分析。

（二）本土化問題提出的學術價值和政治意涵

面對西方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進入 21 世紀後，“本土化”作為一種話語實踐在中國學界的呼聲越來越高。^④一般來說，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從學術研究的層面講。1990 年代西方女性主義在中國的迅猛傳播，以及國人對西方女性主義的熱衷，表面上看轟轟烈烈，其實在學術探討的層面是很不規範的，很難與主流學界和西方學界開展對話。具體來說，一是過於迷信“西方”，試圖用西方的思想觀念來代替中國的歷史文化，不論是文本分析還是事實敘述，更多是機械套用西方的理論概念對中國的歷史文化進行批判或解構，或者用中國的歷史事實作為西方理論的注腳來證明其理論的合理性，而不是用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對西方理論進行驗證或修正，進而豐富其內涵，有著明顯的中國學術“西學化”傾向。直至今日，在婦女與性別研究領域，其“思想和學術的主體框架和脈絡，依然是以西方為主導而承襲下來的”。^⑤因此，本土化問題的提出，很大程度上就是對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本身的一種反思。二是過於迷信“本土”，認為產生於西方的女性主義理論在中國難以找到適宜的土壤，尤其是女性主義在對待男性的態度方面所表現出來的對立情緒，與中國自古以來的和合文化傳統是難以融合的，因此主張用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來改造或抵制西方的女性主義理論。三是過於迷信“女性的”經驗，忽視乃至否認了男性在性別文化建構中的作用，看不到女性經驗與男性經驗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同構性和相互制約性；把社會歷史發展的複雜多樣性簡單化，有的甚至用女性“主義”的政治立場來代替學術研究中複雜的事實判斷，在強調女性在社會歷史文化建構中的主體能動地位的同時，有意無意忽視了傳統的歷史文化對婦女發展的制約因素，將女性的“經驗”絕對化。綜觀世紀之交前後人們對本土化問題的諸多思考，主要是針對婦女與性別研究中的機械套用、盲目照搬、囫圇吞棗、鸚鵡學舌、人云亦云、食而不化，乃至崇洋媚外等狀況而言的，所以，怎樣在理性自覺的基礎上借用“他山之石”為中國社會的發展服務，並將產生於中國本土的婦女研究成果貢獻於世界，是一個時期以來“本土化”討論的核心內容。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說，國人關於“本土化”的諸多訴求，表達了一種複雜的學術目的，“其中既包括了想要抵禦西方學術理論和範式衝擊的民族主義願望，也表現了對那些可能改寫和質疑西方理論的中國歷史的獨有特點展開理論探索的決心”。^⑥

其次，在政治立場的層面看。如果將“全球化”作為一個過程來看待，它既包括資本、商品乃至勞動力的全球流動，也蘊含著各種殖民關係的延續與調整，同時，隨著經濟、政治、文化、科技、信息

等因素的交互作用,還將會對世界各地不同的社會群體帶來不同影響。從世界歷史發展的整體情形看,無論如何都不能否認,女性主義在世界各地的傳播始終是“單向道”的,甚至是以西方的價值標準作為問題導向的。許多主持過國際項目的研究者都有同感,不論立項還是結項,如果不符合“西方”所確立的一定的價值評判標準,是很難達成“合作”意向的。對於“發展項目”的運作,一些研究者敏銳地注意到,“發展”這一概念在西方語境下,與“個人權力”密切相關。為“發展”定義的各種學說學派、最初推動發展研究的學者、資助發展項目的國際資金組織、以及創立和推廣種種培訓方法的訓導者和項目官員,幾乎全部都是西方發達國家人士,而發展項目大都是在發展中和不發達國家具體實施的。許多時候,在“發展”的旗幟下,西方國家通常是以“經濟援助”(金錢)和“文化交流”(話語)為載體的,並在文化交流中堅持(西方)“本土”的主體身份和價值取向。因此,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我們用什麼話語思考和判斷?為誰說話?為什麼說話?說給誰聽?當你用人家的價值判斷去解釋你的情況,‘交流’便可能成為單向的‘後殖民化’過程,主體的喪失是與‘本土’的丟失同時完成的”。^⑦因此,本土化問題的提出對於處在“發展中”的中國而言,首先面臨的就是民族身份的確立問題。這裡,不是用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去抵制來自西方的女性主義理論,而是怕在“西化”的過程中“丟失自己”而找不到“我是誰”。在這個意義上,本土化的強調既是對民族立場的一種堅守,也是對西方文化霸權的一種自覺抵制。

(三)本土化概念的理論局限及其超越

西方理論需要在中國本土“化”是確定無疑的,而當“本土化”作為一個概念範疇對學術研究和社會行為進行規範的時候,其局限性便日益顯露。一些研究者曾敏銳地指出,婦女研究中的中國化或本土化,其關注的要點主要是國外的理論、概念如何為我所用的問題,這樣的思考往往把中國和西方看成是二元對立的關係,即西方是理論生產的中心,中國則處於邊緣地位,或者是被動地接受著外來的影響,或是主動地要把這些理論本土化或中國化。而這種來自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普遍性焦慮,以及由此而出現的“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或者是出於理解本土的良善動機,或者是來自某種民族主義情緒,但目的的錯置卻往往使這些運動可能只能成為“西方理論和方法”的倒影。^⑧一些研究者從思想史的角度也對本土化一詞提出了質疑,認為這一概念的能指與所指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語義鴻溝,使用者的主位意識以及思想資源的“混雜性”狀況,遠非一個“化”字所能概括。從“本土化”這個概念自身的語義結構所引導出來的討論方向看,更多時候把問題限定在了中西二元思維的結構裡,終究走不出西方中心的窠臼,討論易於陷入拒斥西方或是“沒學好”的對抗性的兩極思維中,因此認為“本土化”對學術研究來講並不是一個很貼意的概念。^⑨進一步講,在全球化的視域下,如果將人們的眼界僅僅局限在“中國化”或“本土化”的範圍之內,往往會遮蔽全球化過程中文化生產和理論流動的宏大景觀。儘管本土化這一提法本身包含有力圖創建本土知識的積極意義,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有被殖民歷史的國度對西方殖民文化的一種高度警覺和再度被殖民的焦慮,但基本上還是把知識生產局限在全球/本土、西方/中國的框架之內,還是用中心與邊緣的二元對立的觀點看問題。這樣,在知識生產過程中就假設了一個西方中心的理論出產地,進而自覺不自覺地把自身放在了一種被動的接受者的位置上,或是一種反對者的立場上。不僅在中國和西方之間制造了一些人為的對立,而且阻礙著跨國女性主義實踐在相互交流中對知識的創新。^⑩所以一些研究者認為,不論從研究議題,還是理論方法,抑或研究範式上講,“本土化”都是一個“偽命題”。^⑪由此看來,中國的婦女與性別研究,乃至整個學術研究,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對“本”(我們自己)的強調,始終將中國和西方放在了一種二元對立的狀態之中,要麼把西方女性主

義作為標準來規制中國婦女與性別研究的內容或範圍，乃至行動的方向或路線；要麼以本土的歷史文化作為出發點，在對其特殊性的強調中有意無意將外來文化拒之門外。這種狀況既不符合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具體實際或複雜狀況，也不利於女性主義在全球化過程中的相互交流與碰撞。

在筆者看來，本土化概念還難以有效說明傳播主體身份的多重性。綜觀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傳播過程或歷史進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不容忽視，這就是海外華人學者在女性主義理論引進與推廣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她們不僅頻繁地穿梭於母語和其他語種之間，通過語言文字的翻譯進行國際學術交流，而且通過自己對中西方文化差異的獨特體驗，試圖在中西方之間架起橋樑。面對“海外華人學者”的身份，以及她們在主體身份上的雙棲性質，使得“本土化”一詞的內涵變得複雜。比如，在“化”的方向上，既包括在中國本土“化”西方——引進西方文化，也包括在西方本土“化”中國——傳播中國經驗，講述中國故事。她們作為西方人眼中的中國人和中國人眼中的西方人，不僅有著“根”在中國“身”在海外所帶來的諸多身份困擾，同時也有著“西方人”和“中國人”所不具有的許多語言和文化優勢，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說，這些“在外的局內人”或“缺席的局內人”(insider without)在位置或身份的不斷轉換中，能夠從更多不同的角度觀察和分析問題。¹²對文化兩棲者來說，“越界”不只是簡單地在地理位置上的漂洋過海，跨越文化的界限是其實質所在，“因為這意味著對自我的突破與重構”，意味著在異域文化中不斷審視自己的文化界限，不斷反省在特定界限中構成的自我。¹³由此可見，“本土化”或“中國化”的提法，很難囊括許多海外華人學者在“越界”中不同的文化體驗和生命感悟，也難以說明她們在國境跨越中主體身份的不斷轉換。從一定意義上來講，在跨文化的話語實踐中，海外華人學者對異域(包括西方和中國)婦女與性別研究成果的翻譯或介紹，其本身已經在“化”的過程之中了，¹⁴沒有必要在“本”的強調中束縛手腳。因此，在今天海外華人學者的人數越來越多、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越來越大的情況下，“本土化”一詞的使用的確需要進一步斟酌。也正是由於“本土化”概念在使用中的種種局限，一些婦女研究者早在 21 世紀初就提出，“應該有一個新的詞語出現代替‘本土化’”。¹⁵那麼，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對在地的經驗，我們到底該用什麼語言來表述外來概念的存在”，¹⁶的確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二、女性主義全球在地化的理論意涵

根據一些研究者的梳理，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是 1990 年代才出現的一個新詞，它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在地化(localization)兩個詞的結合。所謂“全球在地化”，就是全球化通過本土所產生的折射。本土不但沒有被全球化消滅、吸收或者摧毀，相反，本土還會影響全球化的最終結果。因此，全球在地化主要是指在全球與本土之間取得一種新的平衡，當全球化趨勢看上去勢不可當的時候，在地化是一個與之相互依存的制衡力量。¹⁷也有一些學者指出，表面上看，全球化的趨勢與在地化的趨勢是對立的兩極，其實不然。二者相輔相成，可以組合成“全球在地化”這樣一個新詞。一方面通過在地的傳統，超越現有國家、民族、宗教的藩籬，開拓全球意識；另一方面，將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抽象理論或概念還原到一定國度的歷史情境之中，“不能用抽象普遍的概念打高空，而要通過在地的傳統的文化展示具體的普遍性”。¹⁸還有一些學者指出，“全球在地化兼具了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雙向連接關係，即普遍性的特殊化和特殊性的普遍化”。普遍的特殊化是指普遍性問題的全球具體化；特殊性的普遍化是指對於特殊事物的尋求具有全球普遍性。“這種‘特殊性的普遍化’與‘普遍性的特殊化’概念的接軌，讓地域性的思想或行為模式不會單純只是屬於某個

地方的產物,而有發展成為全球趨勢的空間和可能性。”一旦在地的事物或觀念變成全球的事物或觀念,就會取得某種普遍性的發展,不過這種普遍性在落實或應用到其他地域時,又會在融合當時特色與條件的狀態下成為在地事物的重要組成部分。全球化的發生是以在地化的形式展現的,而在地化的運作又內含著全球化的作用,“兩者在分析上雖然是一雙向過程,但實際上應視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兩者間的關係既依賴又自主,構成一體的兩面”。這樣,以全球在地化的觀點來看待全球化,各個社會實體選擇參不參與全球化本身,都會產生正反兩方面的後果。因此,如何做好在地的各種準備並創造良好的條件,善於利用全球化所帶來的各種資源,並能自覺抵擋負面影響的入侵,就成為全球化潮流下對各社會實體的一種重大考驗。¹⁹

就全球化與本土化的關係而言,美國學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曾指出,雖然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概念從根本上形成對立和互補的雙方,它們都相對於對方而定義,但是,一些文化現象本身就兼具全球與本土的共同特質,成為“全球本土”(glocal)的不同構型。²⁰儘管在本地敘事意義上的“本土”保持了一種空間上的具體聯繫,但是作為批評性概念的“本土”,其邊界應該是開放型的(或鬆懈型的)。當代“本土”本身就是一個充滿發明與建構的場所,因此只有在解決社會矛盾的過程中,即“建構”在“構成”敘事的過程中,才能對它進行再定義。²¹何為“全球化”,一些研究者認為,在全球化的過程之中,國家、地區、種族、性別、學科之間的界限逐步被打破或重構,不論在思維方式上還是文化交流中,人們都試圖“質疑那種把全球/地方或者中心/邊緣嚴格劃線的政治,對那種不合適的偏見的劃分進行挑戰”。如此一來,全球化就不僅僅是簡單的“全球一體化”過程,而是一種將地域的東西或成功的經驗擴展到全球,同時又通過各個地域的不同經驗把全球化的過程揭示出來的歷史發展過程。世界上存在著沒有進入全球化的“地方”,但沒有不與“地方”相聯繫的全球化。全球化並不是一種虛無縹緲的東西,我們就生活在全球化的過程之中。²²關於全球化與民族主義的關係,一些研究者指出:全球化這個概念出自西方社會,原本是一種經濟行為,同時也是西方價值觀念在全球範圍的普及。在中國,相似的概念是“走向世界”,這原本是一個民族自強的口號,在社會轉型過程中與全球化接軌,使得西方原有的全球化概念具有了中國特殊的民族主義內涵。因此,全球化也成為中國“走向世界”的歷史契機。²³

如果將全球與本土的關係具體化到婦女與性別研究領域,一些研究者指出,“全球化”包含著複雜的內涵,處於不同地理位置和階級位置上的男女在全球化過程中有著不同的人生經歷;“全球化”既包含資本的擴張和殖民關係的延續發展,也包含全球抵抗力量的跨國行動和效應;這個過程中的經濟、文化、科技的發展對各社會群體的效應是複雜和矛盾的,並非一個簡單的肯定或否定態度所能概括。²⁴如果將跨國女性主義實踐置放到全球化的過程之中進行觀照,一些研究者注意到,“婦女解放、性別革命、女性主義實踐在歷史上向來都是世界政治經濟發展和社會文化變遷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當今資本全球化則迫切要求女性主義實踐者聯手開創出具有世界宏觀意義的理論和實踐”。一定意義上來說,“婦女解放的世界或西方起源要求我們進一步研究具有不同世界景觀和規範的婦女解放觀念,是怎樣在世界上傳播並經過怎樣不同的歷史和政治途徑被整合進不同地區,又是怎樣在各地的政治社會歷史上起到不同的作用的”。與此同時,還要不斷研究地區政治經濟和權力的變動又是怎樣不斷重新規範著世界,並產生新的世界動態或價值取向的。²⁵

從上面的簡單梳理可以看出,全球在地化的意涵是複雜而多變的,但不論站在怎樣的角度思考問題,全球和在地作為一個整體永遠是互為表裡的,不僅彼此聯繫,而且相互制約/制衡。“在地”相對於“全球”而言,既是過往已經形成的具有世界普遍意義的一些理論的實驗/實踐場域,也是未來

即將生成的新的全球理論的社會資源和力量源泉。因此,筆者建議,在方法論的意義上,可以用“全球在地化”來代替“本土化”的言說框架。因為,這一概念不僅可以避免“本土化”一詞在使用中所帶來的二元對立情形,而且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全球化”過程中強勢國家對弱勢國家單向度的文化殖民。從表述上來看,“在地化”和“本土化”雖然都具有明顯的地域性特征,但在“本土”前面如果不加“國別”進行限定,如美國本土、中國本土、英國本土、巴西本土、印度本土、日本本土,等等,本土的意涵常常是不確定的。因此,用“在地”來代替“本土”一詞不僅更加簡約,也不會產生歧義,而且能夠充分反映全球化進程中理論傳播的雙向性或多向度。再從當代中國婦女研究“本土化”的具體情形來看,其實並不單單是就中國談中國,中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已經成了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說,中國的婦女研究和學科建設不能無視國外(不限於西方,也包括亞洲)蓬勃發展了幾十年所累積的成果和經驗,但發展中國的婦女學科在引入、借鑒外來的理論方法時,必須首先熟悉中國語境,這樣才能做到逢迎自如、吐納自主、化生自由。我們不但要了解別人在做什麼,怎麼做,在“拿來”別人經驗的同時,更要搞清楚自己該做什麼,怎樣做,進而說清楚自己是怎樣的——這就是中國婦女學在“全球視野”中的“本土探索”之路。^⑤一些研究者早就清醒地認識到,女性主義是從西方的土壤裡生長出來的,而各國的文化背景、具體國情、歷史傳統以及性別問題的表現形式都有許多不同;父權制作為一種世界性的普遍存在,在各個國家的表現形式、對兩性關係的處理方式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如果一味照搬西方女性主義的思維邏輯,就可能犯東方主義的錯誤;而如果一味強調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又有可能犯排斥現代化的錯誤”。^⑥所以,從當下中國婦女研究領域對“在地化”一詞的具體使用情況看,研究者並不是強調西方理論在中國的單向傳播問題,而是著力說明當代中國的婦女與性別研究如何“內外打通”的問題,進而對不同時空中大家不約而同所關注的相同問題(包括歷史問題和理論問題)怎樣相互借鑒或有效說明,以便與主流學界和西方學界展開對話。^⑦一些研究者強調,學術研究在引進西方主流理論或框架時,“需要注重與中國社會情境之間的契合性,進而在中國社會實踐或者歷史傳統中生發出自己的理論概念並與西方理論形成對話”。^⑧由此可以看出,女性主義全球在地化,既包括根據自己所在地域的經濟、文化、歷史、社會性別等狀況重新審視外來理論,選擇適合自己的部分創造性地運用到社會變革的實踐之中,也包括用我們實踐中的經驗和思考去補充和發展外來理論。^⑨如果說,“全球化思考,在地化行動”是人們對全球在地化的基本共識,那麼,將全球作為一個“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地化思考,全球化行動”就成了世界歷史發展的一種必然。^⑩

三、女性主義全球在地化的方法論意義

如果將全球在地化作為一個分析框架,將西方女性主義理論與中國或世界各國歷史文化的交互作用作為研究對象,我們會發現,女性主義既是一種知識生產的工具,同時也是一種社會變革的利器,通過全球在地化,將會對人類社會的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在方法論的意義上,可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將在地與全球相統一

性別問題不只是某一個國家內男女兩性之間的事情,自古以來就存在的性別不平等是一個全球性的社會問題。但在老死不相往來的古代社會,並沒有也不可能將其作為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世界性問題來看待。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有關性別問題的解決方法和性別關係的處理方式,便可以在跨越國界中相互借鑒。那麼,不同的女性主義理論及其主張是在怎樣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

理論在跨越國界的旅行中與所在地的歷史文化又是怎樣交流碰撞或相互融合的？同一理論在不同國度的具體實踐有哪些相同的或不同的經驗？如此等等的問題，都需要通過全球在地化的具體實踐做出回答。對女性主義研究而言，就是要深入了解一定的“理論”及其“流派”所產生的歷史條件，同時根據本國歷史文化的變遷而不斷賦予女性主義以新的內涵，以便在不同的女性主義流派之間、在女性主義與主流學界之間、在中國與世界各國之間、在女性學者與男性學者之間，就性別問題展開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對話。一方面將已經產生的“理論”還原到一定的“產出地”與當時當地的歷史文化傳統聯繫在一起進行再認識，另一方面在與“傳播地”的歷史文化傳統相互交融的過程中進行再創造，再一方面根據本地的或在地的具體實際選擇不同的婦女解放路徑，而不是超越歷史環境的千篇一律。

如果將中國作為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婦女與性別問題的認識或處理也必須將其置於全球化的視野之下進行整體觀照。如一些研究者所說：“中國的女性主義在全世界女性主義思想陣營中大約也應當被視為一種新女性主義。它的基本目標是爭取男女平等的最終實現。”³²事實上，自近代中國的國門被打開以後，女性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文化思潮就在中西方之間架起了橋樑。正如楊聯芬在談到“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女性主義的關係時所做的考證：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Feminism”這個概念就被譯成中文，在先後依次出現的“女子主義”、“婦女主義”、“女性主義”、“女權主義”和“婦女運動”等幾種不同的譯名中，沈雁冰不僅是最早的翻譯者，而且率先使用“女性主義”一詞。1930年代後，“女權主義”逐漸取代“婦女主義”成為最普遍的譯名，而借鑒日文的音譯“弗彌涅士姆”則從未流行。她強調：“西方女性主義思潮因歷時性動態發展而在20世紀初呈眾聲喧嘩之狀，但‘五四’時期中國知識界主要在真理與常識的層面介紹其民主根源與平等觀念，極大促進了新文化和新道德的建構，使中國女性解放實踐在‘五四’時期獨步一時。”³³這個事例不僅充分說明了女性主義理論所具有的世界普遍意義，同時也從另外一個方面說明，中國近代的婦女解放運動有著明顯的不同於西方的“男性特征”。歷史發展到當代，尤其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北平召開以後，中國社會又掀起了一場婦女研究的熱潮，當時有幾個十分響亮且鼓舞人心的口號，這就是“讓世界了解中國(婦女)，讓中國(婦女)了解世界”；“將性別意識納入發展決策主流”；“用女性的眼光看世界”。甚至有研究者指出，與世界接軌，中國婦女走在了前列。³⁴當代中國婦女研究和婦女運動的推進與近代相比，一個極其明顯的變化，就是知識女性在其中佔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說，世界婦女大會在中國的召開，中國婦女作為國家形象的代表，展示的不僅僅是社會主義中國在婦女解放領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為中國婦女走向世界提供了重要的機遇和場域，同時也培養了一大批婦女研究、婦女組織和婦女活動的骨幹力量。³⁵無論如何都不能否認，當代中國婦女研究以及婦女發展的諸多成就，很大程度上就是女性主義全球在地化的一個結果。

(二) 將理論與歷史相統一

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產生，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它與古今中外婦女在社會生活中的狀況和境遇密切相關。自1792年英國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權辯護》一書問世以來，200多年間有關女性主義的論著層出不窮。它不只是一種關於婦女解放與發展的學問，它同時就是歷史本身。一方面通過對女性“受壓迫”經歷的反復訴說，引起全社會乃至全世界對婦女及其問題的高度關注，另一方面通過對女性“主體能動”經驗的不斷總結，增強女性在社會變革中的時代擔當意識。女性主義與婦女歷史的同構，改變的不只是婦女的命運，而是整個人類的命運——女性作為人類的一半，如果不能得到解放，另一半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放。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產生

於西方各國的本土之上,就“西方”而言,也不是鐵板一塊的,不同國度由於其歷史文化傳統的不同,婦女受壓迫的表現以及解決問題的途徑也各不相同。隨著時代的變遷,其表現形式和解決方法還會不斷發生變化。但鑒於婦女受壓迫或性別不平等這一基本事實的普遍存在,女性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批判理論在世界各國便有了普遍的適用性。也正因為如此,西方女性主義借著“全球化”的東風,開始在世界各地廣泛傳播。而女性主義要在傳播地產生一定的社會變革效應,首先面臨的就是如何處理西方理論與本土文化傳統之間的關係問題。對此,我們從“gender”概念在中國的應用可以明顯看出。

首先,從“gender”一詞的漢語翻譯來看。旅美學界王政主張將“gender”一詞翻譯成“社會性別”,以便與隱含著本質主義的“自然性別”(sex)相區別。但她同時認為,因為在翻譯中找不到恰切的對應詞,這個“被迫”造出來的詞彙“依然用了承載著文化包袱的‘性別’二字,未能表達出gender所標志的西方女權主義的新突破”。在她看來,如果用“性別”來指稱gender,不僅不能傳達當代西方女權主義的原義,而且會使我們對西方理論的理解造成限制,也會將自然的性別和社會的性別相混淆。^③當代中國婦女研究的開創者李小江則主張用“性別”一詞來指稱西方的gender理論。她認為,在漢語言環境中,沒有必要設立“社會性別”和“自然性別”這種隱含著對立性質的概念,因為在中國原本就有“性”和“性別”等概念可以適用於不同場合。“‘性’不僅是自然的、生理的,也帶有人性的意味(如“食、色、性也”);而‘性別’則主要是社會性的,是個體本身的一種標志,也是社會秩序的基本成分。……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自然的生理的與人文的社會的之間,在‘萬物有序’的認識論中,從來就沒有混為一談。……在漢語結構中已經隱含了陰陽兼濟的社會特征。”^④這種看似爭論的討論,其異曲同工的奧秘就隱含其中,即在吸收借鑒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成果的過程中,如何面對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中國傳統。對此,王政側重的是“斷裂”,即借用“他山之石”,試圖甩掉積習已久的性別文化“包袱”;李小江側重的則是“延續”,即將外來經驗與中國的文化傳統有機融合。但不論顛覆還是接續,其落腳點都是以現實為基點,在“中西”、“古今”的交流碰撞中尋找“在時在地”自我發展的基本途徑或最佳路徑。“至於哪些翻譯過來的概念能夠真正站住腳,則是個由本土的具體社會動態所決定的複雜問題。”^⑤

其次,從性別理論在中國的實際應用來看。自gender這一概念1990年代在西方社會盛行以來,就在世界各地到處旅行,並被賦予了各國歷史文化的深刻內涵。^⑥在中國的語境下,賦歷史研究以社會性別^⑦、賦社會以社會性別^⑧,作為人們認識歷史和改造社會的一種理論工具或思想武器,在中國社會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具體表現在對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本身進行檢討、對中國歷史文化資源深入挖掘等方面。如葉漢明在回顧中國大陸和香港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時所做的總結,“如果性別觀念的引進是要‘賦歷史以性別意義’的話,本土探索就要‘賦性別以歷史意義’。這些反思內容無論對中國大陸的婦女史或總體歷史的研究,都是極富啟發性的。但這些概念如何應用於具體研究中,又能否帶來突破,還得看以後的發展”。^⑨根據賀蕭和王政的實證分析,自gender概念在西方問世以來,就在英美學界產生了巨大影響,同時也催生和組織了英美的中國歷史研究界大多數最有影響的新的研究成果。但是,在西方的中國學研究中,研究者更多關注的是社會性別、性和女權主義的對話,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爭執、灼識與學術框架,而在當代中國的婦女與性別研究領域,gender這一概念“對以中文進行的學術研究的影響,要小於它在英語世界中的影響”。^⑩根據筆者多年來的觀察,與西方的“gender”理論相對應,中國學界在文本敘述或話語表達中更多使用的是較為簡潔的“性別”一詞,但就其所論述的具體內容而言,更多是指“社會性別”,即性別的歷史和文化建

構性,探討平等、自由、民主、公正、權力、結構、制度等概念範疇與性別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或聯繫,以及女性在社會變革中的主體能動作用,而與“社會性別”相對應的“自然性別”,以及二者之間在歷史生成中的關係問題則探討較少。近年來,一些性學研究者,將自然的“性”與社會的“別”聯繫在了一起,一方面系統介紹台灣地區有關“性別研究”的理論框架,另一方面則在有意挑戰主流學界的性別認識,質疑“性別”研究中被簡化了的“性”與性別運動以及身份政治。^④與此同時,如何認識一定的性別文化和制度對中國歷史文化所形成的影響——包括積極的促進作用和消極的阻礙作用,如何批判地繼承具有中國特色的“家國同構”和“陰陽和合”理論,如何看待男性學者或思想家在性別文化建構中的作用,怎樣理解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對中國性別文化建構的意義,等等,在不同的學科框架裡都有許多不同的論述。一方面用具有一定普適性的女性主義理論來解釋或解構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另一方面用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來檢驗宏大的女性主義理論在本土的適應狀況,進而為全面深刻地認識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創造條件並提供視角。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說,當代中國“從婦女研究到性別研究並不單單是名稱的改變,它體現的是研究立場從婦女本位向性別本位的轉換,顯示了這一領域的研究者希望走出單一的性別、向更普遍的知識議題進軍和拓展的雄心”。^⑤

(三)將各國與世界相統一

如果我們將全球作為一個整體,將人類社會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將每一個民族國家作為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互聯網和信息化時代的到來,女性主義全球在地化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這種“可能”,不僅表現在女性主義本身所具有的時代價值和社會變革意義,更為主要的是,“各國”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在對外來文化進行借鑒的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本土自覺意識。對此,我們從世界女性主義的經典《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一書在全球傳播中的“被改編”或“被改造”可以明顯看出。根據荷蘭女性主義學者凱西·戴維斯的細致梳理和介紹,該書自1971年出版發行後,在美國本土的銷售就超過400萬冊,後經過13次重大修改,2011年出版了最新版。這部被稱為“女性健康的聖經”,主要描述了一代又一代的女性如何感知自己的身體、性欲和性關係、生育和健康。就其影響而言,它“改變了美國醫療保健的條款規定,促進了其醫療保健政策的形成,同時也促進了對女性健康問題的研究”。^⑥在這一寶典的作用下,使得婦科檢查變得更加適應女性的需要,醫院裡對分娩的處置也更加人性化了,女性對自己的身體具有了更多的知情權。從政治意義上來說,“確認了女性的體驗經驗是挑戰醫學和文化中關於女性身體的教條說教的一種資源,並以此來證明賦予女性個人和群體以權利的知識政治的重要性”。^⑦

這部書不僅在美國極受歡迎,而且在美國本土以外也產生了巨大影響,通過全球各地女性主義活動家的翻譯和改編,至今已有36個外文版本。這部由一群“外行”女人(相對於傳統醫學)所撰寫的且非常“美國化”的關於女性健康的女性主義著作,為什麼會引起社會、文化和地理位置如此不同的婦女們的共鳴?凱西·戴維斯分析到,這本書在全球的旅行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表現在“翻譯”方面,它不是將原著完美地“再現”,而是通過“非忠實性挪用”將其改造得更加適合本土的語境。具體來說,就是“試圖在其可運用的方式方法內進行改編,加工出適於本土語境並可解決當地婦女所面臨的需求和問題的改編本”。^⑧一方面用腳注的形式說明其本土與美國語境之間的差異,另一方面說明譯者對該書做了哪些改變和為什麼要改變。相對於原著,有採納,也有丟棄,還有改編和添加。如把美國原著中曾經很重要的一些話題——類似常見的健康營養和補救措施,通過重新加工,使其更加適用於本土問題(例如食物稀缺、飲食習慣的差異以及難以得到的美國藥物治

療)。在價值取向上,許多譯本把美國原著中強調的對醫療體系的引導和培養消費者知情權的內容取消了,而將重點放在了傳統治療方法、家庭關係和社區支持上。針對所服務的對象(如衛生服務機構和婦女組織),添加了與本土語境相關的新話題,如尼泊爾農業工作的職業危害和日漸流行的跨境代孕生育,印度日益增長的皮膚美白發生率和與嫁妝有關的暴力,以及韓國對試婚、自由育兒法和生態激進主義重要性的討論,有的甚至將書中的一些插圖換成了與本地婦女生活相關的照片。具體到中國本土,凱西·戴維斯介紹道,2008年,“教育中國婦女”(Educate Women in China)這個團體,集中翻譯了這本書最新版中的幾個章節(如性傳播感染、乳腺癌、避孕方法和暴力與虐待等),並將其用於一場不被非難又容易被接受的健康活動中,用一種名為《每日健康提示》的問答形式的短信,在全中國通過移動電話廣為傳播。⁴⁹其實,早在1994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中國籌備期間,一個名為“中國心理衛生協會婦女健康與發展專業委員會”的非政府組織就開始翻譯這本書,整個翻譯過程用了四年時間,1998年由知識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書中文版主編劉伯紅說道:“在中國,人們習慣用新生兒死亡率或孕產婦死亡率來衡量婦女健康狀況。這本書為人們提供了一個看待婦女健康的新視角,它把婦女健康看作是貫穿婦女一生的問題,而不只是一生中某個階段的問題。”該書出版後,僅在北京,20天內便被搶購一空,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重印了三次。⁵⁰上述事例充分說明,“身體”和“健康”作為一個世界性的議題,不只屬於某一個具體的個人和國家,其中的一些思想和理念需要全人類共同來分享,而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思想或觀念,需要通過對文本的改編、改造、刪除、添加等各種不同方式,賦予原產地“知識”以本國具體的歷史文化的實質內涵,以便使具有普遍性的理論變為本土的具體行動。

綜上可見,本土化、在地化、全球在地化等概念範疇的出現,既是包括女性主義在內的各種社會思潮在世界範圍內廣泛傳播的一種折射,同時在知識生產領域作為一種研究方法或分析視角,可以使人們從多個不同角度認識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複雜多樣性。全球在地化這一概念的提出,不僅可以避免本土化概念所帶來的二元對立的局限,而且可以超越在地化本身所具有的單向度傳播藩籬。將“全球”與“在地”合而為一進行整體觀照,既可說明在地與全球互為表裡的辯證關係,也能反映相互之間在不同時空中的矛盾與對立。但不論怎樣,“世界各地”作為全球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要保持本民族所獨有的文化生態,以顯現世界的豐富多彩性,而且在“命運共同體”的框架下,要為人類的文明與發展做出貢獻。

①董麗敏:《“在地化”的性別研究如何可能——評賀桂梅新著〈女性文學與性別政治的變遷〉》,北京:《婦女研究論叢》,2015年第1期;董麗敏:《性別作為文學分析的方法——評〈性別視角下的中國文學與文化〉及相關系列叢書》,北京:《婦女研究論叢》,2019年第1期。作者在後一篇文章中指出,內外打通的“在地化”論證思路,可以使性別研究在中國落地生根奠定合法性的基石,進而將婦女研究與主流研究相貫通。同時強調,長時段的性別文學史架構試圖解決的是“性別文學”的“歷史化”問題,而發現甚至

發明“性別文學”與同時代重要事件/概念的關聯,其實要處理的是“性別文學”的“在地化”問題。比如,作為性別文學研究的重要術語“身體”概念及其話語的域外色彩是顯而易見的,而要“建構中國女性身體書寫的歷史”,就必須將“身體”概念所具有的“域外色彩”中國化。因此,“性別文學”作為一種研究範式,只有在內外打通的層面上被使用,其邊界和內涵才能極大拓展,進而為處在邊緣但又不僅僅局限於邊緣位置上的“性別”對主流世界發出聲音找到一種可以操作的基本路徑。作者所要強調的是1980年代

以來中國的文學/文化研究與國際學界的“暗合”性質，以及這種“暗合”在進一步的相互“融合”或交流互動中，對人類歷史文化所形成的影響。

②比如，王興國：《“全球化”與“在地化”的當代新儒家——以劉述先和蔡仁厚為例》，上海：《社會科學》，2016年第3期；韓周敬：《中國科舉制度的南植和在地化》，南寧：《東南亞縱橫》，2016年第4期；錢明：《明末浙江大儒朱舜水流寓日本後的主動在地化》，貴陽：《貴州文史叢刊》，2017年第2期；王琛發：《閩南王爺在南洋：跨國信仰的國際性、歷史感與在地化》，福建漳州：《閩台文化研究》，2017年第4期。

③郭震旦：《音調難定的本土化——近年來若干相關問題評述》，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

④比如，王金玲主編：《女性社會學的本土研究與經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杜芳琴：《婦女學和婦女史的本土探索：社會性別視角和跨學科視野》，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高小賢等主編：《社會性別本土研究叢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余寧平、杜芳琴主編：《不守規矩的知識：婦女學的全球與區域視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董麗敏：《女性主義：本土化及其維度》，天津：《南開學報》，2005年第2期；暢引婷：《西方女性主義學術思想的傳播及其本土實踐》，昆明：《思想戰線》，2005年第4期，等等。

⑤②④⑤吳小英：《性別研究的中國語境：從議題到話語之爭》，北京：《婦女研究論叢》，2018年第5期。

⑥③④③賀蕭、王政：《中國歷史：社會性別分析的一個有用的範疇》，上海：《社會科學》，2008年第12期。

⑦②③④李小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婦女研究與國際發展項目——兼談本土資源和“本土化”問題》，昆明：《雲南民族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

⑧閔冬潮：《全球化時代的理論旅行：跨國女性主義的知識生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頁。

⑨⑩宋少鵬：《立足問題，無關中西：在歷史的內在脈絡中建構的學科——對中國“婦女/性別研究”的思想史考察》，北京：《婦女研究論叢》，2018年第5期。

⑩閔冬潮：《理論旅行再出發》，杭州：《浙江學刊》，2014年第4期。

⑪謝宇：《走出中國社會學本土化討論的誤區》，北

京：《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2期。

⑫閔冬潮：《Gender(社會性別)在中國的旅行片段》，北京：《婦女研究論叢》，2003年第5期。

⑬⑭⑮王政：《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前言第1頁；第199~200、216頁。

⑭“化”不只是一個抽象的學術概念，而是一個非常複雜而艱難的“過程”。閔冬潮在談到跨國女性主義實踐時曾列舉過一個事例，同一篇文章，最早在中國發表，後將中文翻譯成英文，再後來又將英文翻譯成中文之後，“曾引起中國聽眾理解上的困惑”，其中的一些內容幾經轉換已經“面目全非”了。作者在分析其原因時說道：“由作者之一翻譯成英文稿之後，對原文中具有‘中國特色’的部分概念詞彙做了減法，而對國外讀者熟悉的術語概念又做了加法。由此再翻譯的中文稿保留了這些新的概念，可能是導致中國聽眾不能理解的原因之一。”見閔冬潮：《通過翻譯創造女性主義共享的知識》，杭州：《浙江學刊》，2016年第2期。

⑮高小賢等主編：《社會性別與發展在中國：回顧與展望》，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頁。

⑯何成洲：《全球在地化、事件與當代北歐生態文學批評》，武漢：《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

⑰劉述先：《對全球在地化問題的反思與響應》，廣東深圳：《深圳大學學報》，2014年第2期。

⑱徐偉傑：《全球在地化：理解全球化的一條路徑》，台北：《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2003年第1期。

⑲⑳阿里夫·德里克：《跨國資本時代的後殖民批評》，王寧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22、163頁。

㉑閔冬潮：《從全球女性主義到跨國女性主義——兼論跨國女性主義知識生產》，北京：《婦女研究論叢》，2005年第5期。

㉒王玲珍：《關於中國革命與性別平等/解放理論的再思考》，北京：《婦女研究論叢》，2017年第5期。

㉓杜芳琴：《婦女學和婦女史的本土探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自序，第2頁。

㉔⑳李銀河：《女性主義》，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2、235頁。

㉕董麗敏：《性別作為文學分析的方法——評〈性別

視角下的中國文學與文化》及相關系列叢書》，北京：《婦女研究論叢》，2019年第1期。

③閔冬潮：《我們從何而來，又想到何處去：'95世婦會與全球化》，山西臨汾：《山西師大學報》，2020年第4期。

④楊聯芬：《新文化運動與“女性主義”誕生》，北京：《文藝研究》，2019年第5期。

⑤參見黃婉玲編：《女性的反響：一群參與九五婦女大會國際籌備會議的中國女性的心聲結集》（北京，1995年）；劉伯紅、謝麗華、吳華主編：《女性的反響·續集——紀念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二十周年》，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5年；謝玉娥編：《智慧的出場：當代中國人文女學者側影》，河南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張李璽主編：“傾聽與發現：婦女口述歷史叢書”第7~9卷《記錄她們20年的行動足跡——北京+20婦女活動家訪談》，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2015年。

⑥王政：《“女性意識”、“社會性別意識”辨異》，北京：《婦女研究論叢》，1997年第1期。

⑦李小江：《中西文化關鍵詞：性別（Gender）》，見《跨文化對話》第11輯，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23~124頁。

⑧參見閔冬潮：《一個旅行的概念：Gender（社會性別）——以北歐、東歐和南美對Gender的翻譯為例》杭州：《浙江學刊》，2005年第1期；《從全球女性主義到跨國女性主義——兼論跨國女性主義的知識生

產》，北京：《婦女研究論叢》，2005年第5期。

⑨參見蔡一平、王政、杜芳琴主編：《賦歷史研究以社會性別——婦女史學科建設首屆讀書研討班專輯》，1999年（內部讀本）；杜芳琴主編：《引入社會性別：史學發展新趨勢——歷史學與社會性別讀書研討班專輯》，2000年（內部讀本）。

⑩參見王金玲主編：《賦社會以社會性別——“社會性別與社會學”讀書研討班專輯》，2000年（內部讀本）。

⑪葉漢明：《婦女、性別及其他：近二十年中國大陸和香港的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及其發展前景》，台北：《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3期，2005年12月。

⑫參見黃盈盈：《性/別、身體與故事社會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12頁。

⑬⑭⑮⑯凱西·戴維斯：《女性主義作為理論旅行和跨國實踐——以〈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一書為例》，沈齊齊譯，閔冬潮審校，杭州：《浙江學刊》，2016年第2期。

⑰中國發展簡報（China Development Brief）2005年12月8日，網址：www.cdb.org.cn。

作者簡介：暢引婷，山西師範大學歷史與旅遊文化學院教授。山西臨汾 041004

[責任編輯 桑海]